

鬲出太行 所以先商

许伟 卜工

先商文化是中国考古的大课题，三代文明的重头戏。从先商到晚商，有神器物宛若神秘的伴侣不离不弃，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既是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又是记录成长发展的定位神器，这便是考古上司空见惯的陶鬲。它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是探索商人起源和先商文化的本源与起点，舍此，别无他途。

美联合考古队，合作开展“中国商丘地区早商文明探索”项目。2020年以后各类考古工作站相继在商丘建立，商丘考古进入宋城阶段。但是，先商文化的探源依旧未果。

转机出现在1980年。是年，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横空出世，他以郑亳说为依据，明确提出商人起源河北龙山文化。这个“豫北冀南说”完全颠覆了过去的“豫东说”，遂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认识。先商文化探索迎来革命性变化。

1980年、1981年山西太谷白燕遗址发掘，1982年、1983年晋中五县考古调查，1987年、1989年忻州游鹿遗址发掘，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高领鬲、双鬲鬲这些区域特征的遗存而展开的攻坚战。这一系列的组合拳获得大量崭新资料，颠覆性的认识体系应运而生；晋中陶鬲的深度研究更是把先商陶鬲的起源锁定在晋陕高原。原来河北龙山以及先商的诸类型居然都是晋中陶鬲的血脉，它们通过“太行八陉”实现了东出太行的壮举，并在其东麓创造出更大的辉煌。先商文化的探索进入到定量研究的新阶段。

其实，早年邹衡先生已指出先商文化可能来自河北龙山文化的许坦型，李伯谦先生也讲到下垣文化与晋中地区的关系密切。然而，在晋中陶鬲研究以前，对先商陶鬲体系性认识依然没有走出推测与假说的局限。

从“豫东说”到“豫北冀南说”再到晋中陶鬲说，是地上地下材料整合研究的突破性成果，是晋中陶鬲谱系研究的势所必然，更是用地下资料校正文献局限性的典型案例。

东出穿越的时空

在黄土高原地形形色的诸多陶鬲类型中，只有晋中陶鬲与先商的关系渊源至深。《殷商联姻 其利断金》指出，晋中陶鬲对于定性有族族属、钩沉联姻制度、探索商人起源，对于重新定义区域特征都具有开创性的启发意义。晋中陶鬲的一支东出太行是上古时代惊世骇俗的重要事件，对于认识商人起源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其东出的时间和路线又如何呢？

第一个阶段是晋中陶鬲的矮领双鬲时期。这是传统意义的龙山时期。资料表明，晋中的双鬲鬲至少有5个年代组。第1组杏花村H118，第2组游鹿H348、H291，第3组游鹿H367，第4组游鹿晚期H129，第5组游鹿晚期H2。其中，前三组系矮领双鬲，后两组是高领双鬲的特点，此时高领鬲口还饰有篮纹，双鬲鬲未退去。与二里头一期还有大量篮纹的情况非常相似。游鹿晚期恰好发现一组二里头第一期的陶器。所以，高领双鬲鬲的下限实际上已经进到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

近期的研究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遗存属于少康中兴后的夏代晚期，而早期夏文化在龙山晚期的切割不甚明显。《史记·殷本纪》说“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所以，殷契的先商与大禹的夏代一样应该在龙山时代寻找。更直白地说，龙山时代就是帝尧加尧舜禹契的精英时代。因此，龙山期的矮领双鬲鬲东出太行就能够与先商搭上关系了。

果然，证据确凿。河北蔚县涿子绦罗（太行八陉之飞狐口）、河北邯郸洺河（太行八陉之滏口）、河南汤阴白营（太行八陉之白陉）所发现的矮领双鬲鬲，都与忻州游鹿H291的毫无二致（图1）。这些陶鬲遗存取道漳沱河、漳河、淇河东出太行最为便捷。与“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历史记忆相呼应。相土是殷契之孙，属先商早期，足证东出太行大获成功。但是，此后其在太行山以东的发展线索却不十分明朗，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这自然让研究者联想到王亥进一步关于王亥事件的考证。王亥是第七代商王，被有易氏所杀，是鬲出太行以后的重大事件。

第二个阶段是晋中陶鬲的高领鬲时期。这是晋中陶鬲的第二波东出浪潮。历史的回声在河南鹤壁刘庄与河北唐县北放水等遗址响起，尤其是高领鬲的发现更让人拍案叫绝。其形态与白燕高领鬲如出一辙，惟妙惟肖，属于同一系统确定无疑。

在晋中地区夏代高领鬲序列中，游鹿H2高领双鬲鬲最早，相当于二里头一期，白燕H98的高领鬲次之，大致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再次是白燕H158的高领鬲，相当于二里头二期偏晚，接下来才是刘庄M94和北放水的高领鬲。它们在太行山东麓的发展是向商式翻沿鬲转变，器物组合则是逐步融入夏文化大背景的因素。这与留守在晋中地区的有族族群形成显著区别。后者是高领鬲渐变成侈口深腹鬲，并配以敛口罍、卵形釜等器。

邹衡将二里冈商式鬲分为翻沿和卷沿两型，其中，翻沿鬲常见，是二里冈商文化的主体。晋中高领鬲东出太行以后发展为翻沿商式鬲的轨迹非常明确，河南鹤壁刘庄、河北唐县北放水都见证了这一过程。因此，先商陶鬲的主体来自晋中没有问题。而白燕高领鬲来自双鬲鬲的事实，则表明先商文脉的源头就在龙山时代中期。

陶鬲东出的两个阶段，其结果明显不同。矮领双鬲鬲到达河北蔚县涿子绦罗时，明显是忻州游鹿遗存的整体搬迁，敛口罍和三足釜等重器一个也不少。而且，双鬲鬲大有从南到北各个隘口全面向东推进的意味，只是其后续的线索却不甚明了。而高领鬲出太行，显然不是那种整体搬迁式的大场面，更加突出和强化标型器的引领作用，以太行山南段的隘口为东出的重点，其结果是在当地生根开花，逐步强大。这或许是商人为融入华夏而作出的必要选择。

鬲出太行始于忻州游鹿遗址早期。那些矮领双鬲鬲虽是晋中地区最早陶鬲的代表，但属于龙山时代的中期却没有问题。它们是高领双鬲鬲的直接前身，自然是二里冈商式鬲寻根问祖的源头。为什么它们前赴后继、执意东出？这无疑要归功于殷商先祖的文明觉醒。否则，怎会有后来商人的鬲定天下？东出太行显然是商人命运的历史性抉择。

淇河平原的刘庄

河南鹤壁刘庄遗址出土的遗物提供了高领鬲走向翻沿商式鬲的完整过程和具体环节，是晋中陶鬲东出太行的直接证据和基础所在，意义十分重要。

刘庄位于太行山东麓山地与平原过渡的低矮丘陵边缘，遗址分布在高程90米左右的淇河平原，扼守太行八陉第二隘口白陉，是先商陶鬲东出太行的主要路线和必经之地。所以，刘庄遗址的338座先商文化墓葬就非常可贵了。

刘庄墓葬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墓葬数量多，二是出土陶器丰富，三是器物组合个性化突出。加之，发掘报告关于墓葬分期与年代的认知基本正确，文化来源说得清楚，发表资料翔实充分等等。因此，提供了观察先商居民社会生活的最佳窗口，是先商文化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显然，有了刘庄的先商墓葬，晋中高领鬲发展到商式鬲的递进线索才能一目了然，先商文化的探索才能走得更远。这大概就是“富矿”的真谛（图2）。

首先，东出太行让先商创造出规模经济，否则就不会有如此罕见的大型墓地。墓葬资料的排队分期基本正确，逻辑关系比较清晰，结论令人信服。按照晋中陶鬲的认识，这里最早M94当晚于白燕H158，也就是说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二期或偏晚的可能性很大。

其次，经营的村落具有连续发展，稳定发展和融合发展的特征。墓葬组合具有多样性就是最好的证明。鬲豆、鬲豆盆、鬲豆盘是典型商人组合，而单把罐盆、盆形鼎、鬲与爵则具有浓郁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充分表现出东出太行的先商，已经在融入中原的进程中开始了新的实践探索。M159鬲爵鬲的共生，是夏商两种礼器融合的信号。M218、M236、M308是盆形鼎与先商鬲共生的代表，显示出民间习俗的融合。这种情况与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二里头夏文化和晋南戎文化虽然共处，但两者的器物却不共生，灰坑墓葬都是各自各的器物，是典型的“和而不同”，因此，其不等于融合。是否出现融合的问题要依据考古学单位内涵的研究，鹤壁刘庄M159可认为商夏族群的融合已经发生，东下冯的情况则是相反的案例。

发人深省的启示

启示1：西方的商人起源西来说是伪命题。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有三个“西来说”是西方学者按《圣经》演绎出的认识。即人类文化与文明起源首先发生在西亚中东地区，然后向世界各地扩散和传播。仰韶文化西来说和中国文明西来说早已已被中国考古学界与研究否定。现在，商人起源西来说也迎来重新检讨的时刻。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中说：“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商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商朝文明由诸多成分组成，如大麦、小麦、羊、牛、马、青铜和轮子等若追溯到其新石器时代的起源，无疑将发现，它们最早发源于中东。”这是商人起源西来说的主要依据。但是，用晚商的考古资料推测商人起源，明显在理论逻辑上失之偏颇，更有悖于中国古代的史情。

首先，族群起源要看血脉基因，要查族系传承，要辨文化传统。个别文化现象只能说明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与族群起源毫无关系。本文从先秦文献关于帝喾高辛联姻的记载出发，验之以甲骨金文的研究成果，解析先商的文化传统，进而发掘出商人祖先东出太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其次，年代是关键要素。先商陶鬲在龙山时代中期（距今约4500年）就已萌生，其时代遥遥领先，而那些所谓的“新成分”只是商人最后200多年间的殷墟时期才获得发展，根本不足以支撑商族起源西来说。舍本逐末，避重就轻，偷换概念，显然漏洞百出。

启示2：城商联姻是认识先商的不二法门。晋陕高原活跃着庞大的戎族群，其流动性强，与周边地区联系广泛。有城集团只是这个大家族的成员之一，其昔日都城“有城之墟”，即石峁古城的区位优势更是耐人寻味。那座规模巨大的城池正矗立在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交界地带，古往今来便是交通要冲，北方的游牧、南面的农耕、东来的渔猎经济，以及西域的文化影响在此汇聚。这里出门便是草原道，向西可眺望河西走廊，穿越阿尔泰山进入哈萨克丘陵地区，可抵达中亚。向东与燕山地带遥遥相望，向北通包头，向南达西安。这个地理优势是解读商人通过联姻制度广泛吸纳西方技术的钥匙。为什么在殷墟以外地区，会在晋陕高原的清涧寨沟等遗址发现商代车马器？这无疑证明戎族群是链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媒介，是商人获得西来新物种和新技术的主要渠道。

启示3：鬲出太行是殷商先祖的文明觉醒。族群的发展需要寻求更大的生存空间。殷契的选择势所必然。“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足证东出太行取得成功，不仅扩大了先商族群的影响，更创造出“长其其祥”的完美开端。学术界普遍认为《诗经·长发》开篇说的“俊哲维商，长发其祥”是赞颂殷契智慧的文字，现在终于可以理解，这个泽被后世的大智慧就是东出太行的历史性抉择。而那些难以释怀的商丘印象，只是其后人的朦胧回忆。

启示4：迁徙推动文明升级是历史规律。鬲出太行凝结着文化迁徙特有的艰辛，是商人起源的正解。这种历史现象在中国古代不胜枚举，堪称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红山文化的西进被河北宣化郑家沟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良渚文化在鼎盛时期也有一路人马挥师南下。距今5000年前后与江西赣江流域的文化重组，翻越大庾岭进入今日广东韶关地区，完成了石峡文化的蜕变。尔后，其势力逐渐推至珠江三角洲及其以南，谱写岭南文明的壮丽篇章。

举世瞩目的三星堆古蜀居民最后也选择了北上关中的迁徙道路。他们在盛大祭典后，掩埋了镇国重器，翻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进驻陕甘南，成为武王征商的重要力量。在《史记》周武王八大外援中以第二排名的显赫位置彪炳史册。其胜利后的加官进爵，与周人联姻等事迹均记录在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铜器上。

这些无疑都是文化迁徙推动文明升级的经典案例和历史见证，是中华文明英雄史诗感人至深的伟大篇章。

郑州商城与商汤都亳的交织

——郑州商城发现70年的回望与思考

段宏振

1952年，郑州二里冈遗址发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遗存。1955年，郑州商城遗址被确认发现。1959年，徐旭生调查偃师二里头遗址并推测其性质可能为汤都西亳。1961年，发掘者认定郑州商城为仲丁所迁的郟都。1978年，邹衡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颠覆了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和郑州商城郟都说，由此开启了夏商文化分野的大讨论。1983年，偃师商城发现后，又增加了偃师商城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的争论。七十年来，郑州商城考古发现不断累积，其性质或郟都或亳都的争议，尤其是与汤亳交织在一起的大讨论，使其成为夏商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考古历程与探索经验值得回顾与思考。

郑州商城遗址与郟都

20世纪50年代，郑州二里冈遗址发现大面积商遗存，发掘者即怀疑其为仲丁所迁的郟都。郑州商城遗址得到确认之后，发掘者正式提出郑州商城即商代第十王仲丁所迁的郟都。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不仅找到了早于殷墟的商文化，而且还是一处大型都邑遗址，由此商文化的考古学年表上溯至商代中期，这是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与此交相辉映的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又发现早于郑州商城一个阶段的文化遗存。进入20世纪60年代，二里头晚期被认定属于早商文化，遗址性质被推定为商代第一王成汤的亳都——西亳。至此，从商代最早期的汤之亳都二里头，到商中期的仲丁之郟都郑州，再到商后期的殷都安阳，商代三座都邑的迁徙历程及商文化的发展脉络，似乎均已清晰可辨，整个商代考古学年表似乎也已完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三处年代大致前后连续的商都遗址，一直被作为商年表和商文化的典型考古学标杆。然而，1978年邹衡的一篇文章，颠覆和打破了这一格局。

从汤居三亳说到郑亳说

商汤灭夏立商，是完成夏商交替的商朝第一王。《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尚书·立政》：“三亳既尹。”基于此，汉以后的经史学家们便注疏演绎出汤曾居有三亳之说，即：偃师西亳、商丘北的北亳、商丘南的南亳。汤居三亳说虽受到一些质疑，但一直广为流传。雷学淇、王国维相继否定三亳之说，均考订只有北亳才是汤都。董作宾利用殷墟卜辞复原商末征人方的路线，由此证明只有南亳才是汤亳。至此，长期纷扰的汤居三亳之说似乎已经平息，但现代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又促使老话重提，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使汤都西亳之说复活，并且在1977年之前差不多已是考古学界所公认的论点。

1978年，注定成为夏商文化研究的关键年份。邹衡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这便是汤都郑亳说的起始。郑亳说不仅是关于商都地望的一个重新论定，也是对原有夏商文化编年体系的一个重大修正。郑亳说主要论据有四：《左传》记载春秋郑地有亳城、郑州商城出土东周“亳”字陶文、与汤亳相邻的葛即在郑州附近、郑州商城的年代与内涵与汤亳相合。然而，这些论据遭到了逐一的质疑和挑战。

二里头西亳说与郑亳说的争论

郑亳说的颠覆性内容引起学界激烈的讨论。几乎与郑亳说发表同时，二里头发掘者提出了鲜明的相反意见：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二三期之间，其前为夏代文化，其后属于商文化。自此开始，郑亳说与西亳说的争议以及与此相关的夏商文化分界等问题的论战便拉开了序幕。

1980年至1982年，西亳说与郑亳说之间的争论进入高潮阶段。二里头发掘者连续发表与郑

亳说商榷之文，邹衡进行了答复。郑州商城发掘者则继续坚持郟都说，并支持西亳说，另还有先商丘南亳、后西亳说者。双方之间的争论，除了文献依据与陶文异议之外，最大的分歧还是在考古学层面，具体说来就是二里冈下层与二里头三期二者，究竟孰是早商文化的起始。这一问题表面上看是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判定，其本质乃是考古学上的夏年与商年之分，其切入点正是汤亳时期早商文化的辨析与确立问题。

西亳说与郑亳说之争，促进了关于夏商文化分界问题的讨论。自此，关于二里头遗址性质的争议开始进入纷扰阶段，或主张皆为夏，或认为部分属夏，以至夏商文化分界的看法涵盖了二里头分期的每两个期之间。但总体来看，争论大体上包括两大意见，即：二里头遗址皆为夏或部分属夏，其焦点就是将夏商文化分界置于何处，而这一问题又直接关联着最早商文化的载体——汤都之亳的考古学确认。这些讨论反映了郑州商城与汤亳的艰难对应，也正是夏商考古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偃师商城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的竞争

1983年偃师商城的发现及由此而来的新西亳说，给旧西亳说与郑亳说带来了挑战。新西亳说更替二里头西亳为偃师商城西亳，又将二里头二三期或三四期之间的夏商文化分界，修改在二里头四期早晚段之间。汤亳地望之争进入纷扰复杂化时期。

面对偃师商城新西亳说，郑亳说者回应称偃师商城的性质为太甲所居的桐宫，同时还修正了关于郑州商城始建年代的看法：原认为二里冈下层H9（南关外期）时尚未筑城，现改为此时已经筑城并具规模，但关于商文化年表则继续保持原有看法，即南关外期仍为先商时期。

1998年至1999年，新西亳说者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确认：偃师商城小城的始建年代为商城一期一段，亦即早于二里冈下层一期H9所代表的时期；偃师商城是汤灭夏之后所建的新王都——西亳，因此是最早王朝交替与文化分界的界标，一期一段就是最早的商文化。很明显，在新西亳说者看来，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早于郑州商城一个阶段，夏商文化分界则较郑亳说提早两个阶段。要之，新西亳说以偃师商城作为最早商文化

的载体，以此否定郑亳说。

少数二里头旧西亳说者依然坚守原有的观点。他们或提出夏商文化的分界在二里头一二期之间，并重申夏商一元结构；或同时质疑郑亳说与新西亳说的研究思路及方法，批评他们从客体的两个商城入手，来推断主体的二里头遗址为夏都和夏文化。可以看出，与旧西亳说相比，新西亳说与郑亳说之间的分歧已大幅缩减。新西亳说已接受认可郑亳说关于先商文化的论点（即支持下垣文化体系），或者说立足于夏商文化二元结构体系。实际上除了亳邑地望之争以外，关于商文化年表以及最早商年的起始线，两说已经非常趋向接近，可视作基本一致。

另外还有一种将西亳说与郑亳说相协调的观点，认为汤有二都西亳与郑亳。这种观点乍看似为调和之说，但此后随着争论的持续，这一论点的本质竟然成为一种趋向和归宿。总之，原西亳说者的分化，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的趋近，以及汤都二亳等等，表明学界关于汤亳地望与夏商文化分界的认识，已经逐渐趋近于大体一致的认识。

汤亳界标的重新审视

进入21世纪，新西亳说与郑亳说的新一轮论战，集中在汤亳的性质与夏商分界两个问题。新西亳说重申：汤亳分先商方国之亳与早商王国之亳，偃师商城为早商王国之亳（灭夏后的新都），因而是唯一的早商都城界标，不排除郑州为先商之亳的可能。郑亳说则针锋相对，称偃师商城为不准确的界标，同时确定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四期晚段，且略早于偃师商城，因而是汤灭夏前后的亳都，而偃师商城是汤灭夏后在下洛之阳所建的官邑即西亳。

至此，两说对新西亳或郑亳始建年代的认识已趋向一致，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把握也十分接近，尤为重要是，双方已互相承认对方之亳以某种形式的存在。剩余的唯分歧就是：汤灭夏之后的亳都，究竟是偃师还是郑州？这一争论结果的本质就是：何者为亳都，何者即为最早的商文化。若据此，汤居之亳的意义便不再是夏商分界单纯的实物界标，而且还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意象。

以汤亳为基点寻找最早的商文化，本是在无直接文字证据之下，以考古学探索夏商分界的一种辅助途径，但绝非是独一无二的方法与依据，

所谓“唯一”之类的说法不免有些执着，商城始建年代与定都之间似乎并不一定完全重合。郑亳说者在强调确定汤亳的重要性时，还同时指出其他的强求途径：以文化间的同异比较，即文化类型的研究，来找出夏商文化的区别。换言之，汤亳时期商文化的辨识，应当还存在亳邑之外的佐证。毋庸讳言，数十年来关于夏商分界及汤亳地望的争论，虽然最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以汤亳作为界标这一问题上，可能因过于注重于界标本身尤其是时间线，而有些疏远了其原本的基础和意蕴。

两种汤亳说互相认可对方之亳的存在，不仅反映了对文献记载的某种附和与迁就性解释，更显示出早商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与同异比较，来获得最早商年的途径是比较困难的。关于二里头四期遗存年代的多重解释就是一个例证。在没有直接文字的佐证之下，最早商年及夏商文化之分，大概只能获得一个比较接近于真相的、粗略的纵向区间和横向范围。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郑亳说创造的理论体系，以及诸亳说互相争论的实践探索，正是夏商考古学研究的取向与魅力所在。至于在探索与讨论过程中的思路与方法，的确存在着一些有待于完善的问题。然而，大胆求索与质疑商榷相辅相成，互相讨论以补正勘误，正是学术研究的正道。

郑州商城探索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典范

在连续数十年的大讨论中，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紧密纠缠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三处遗址无论是何种名号，都掩盖不了它们作为三代都邑的光彩，以及夏商考古学研究的经典地点，而郑州商城正是这一领域里的一个典范。

郑州商城遗址将殷墟与二里头连接起来，后来又与偃师商城相联系，由此构建起夏商文化比较完整的考古学编年体系，其承上启下，又四方关联，因此成为夏商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性枢纽。在郟都、亳都的争论过程中，尤其是郑亳说与旧西亳说之争，郑州商城遗址成为夏商考古学研究的集中实验场，代表着考古学与历史学融合研究的最前沿。无论亳都二都位于何地，以郑州商城为起点进行的夏商问题大讨论，其本身就是考古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奇迹。

（作者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